

明代南直隶鼎甲进土地域分布与社会流动

管宏杰 郭培贵

摘要：明代南直隶鼎甲进士共有 65 名。其地域分布广泛，反映出明代南直隶重视文化教育，科举之风盛行；同时又明显呈现不平衡性特征，反映出各府、州、县科举实力不均衡，是各地在人口、经济、交通、教育、政治、科举氛围等方面所存差异综合作用的结果。明前期南直隶鼎甲进士出自平民家庭者占比为 33.33%，后期则下降为 9.09%，这主要是由于明后期南直隶鼎甲进士出自官宦和仅有学校功名家庭的数量明显增多造成的。官宦家庭对其子孙中式的影响并非主要凭借政治特权，而是主要依其家庭有利的经济、教育文化条件和科举氛围并最终通过子孙自身综合实力实现的。

关键词：明代 南直隶 鼎甲进士 地域分布 社会流动

明代南直隶鼎甲进士是南直隶进士群体中的翘楚，其地域分布状况成为衡量各地区间科举实力强弱最鲜明的标志，其出身构成状况也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反映南直隶社会流动的代表性指标。因此，探讨这一问题，不仅对促进明代科举史研究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推动明代南直隶地方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一 明代南直隶鼎甲进士的规模

本文所考“明代南直隶鼎甲进士”，是指明代每科殿试取中的现籍地为南直隶的一甲三名进士。明代自洪武四年（1371）至崇祯十六年（1643）共举行了 88 科 89 榜殿试，相应共有 267 名鼎甲进士，其中出自南直隶的鼎甲进士共有多少名？明代历科《登科录》是探讨这一问题的首选资料。但遗憾的是，目前只有洪武四年至万历三十八年（1610）间的 58 科明代《登科录》存世^①。兹即以现

^① 《明代登科录汇编》收入了建文二年，永乐十年，天顺元年，成化五年、八年，弘治九年、十八年，正德十六年，嘉靖十四年、十七年、二十三年、四十一年，隆庆二年，万历八年共 14 科《登科录》（台北学生书局 1969 年影印本）；《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收入了洪武四年，宣德五年、八年，正统四年、七年、十年、十三年，景泰二年、五年，天顺四年、八年，成化二年、五年、十一年、十四年、十七年、二十三年，弘治三年、六年、十五年、十八年，正德六年、十二年，嘉靖二年、八年、十一年、十四年、十七年、二十年、二十三年、二十六年、二十九年、三十二年、三十五年、三十八年、四十一年、四十四年，隆庆五年，万历二年、五年、十一年共 41 科《登科录》（宁波出版社 2006 年影印本），其中，成化五年，弘治十八年，嘉靖十四年、十七年、二十三年、四十一年共 6 科《登科录》与《明代登科录汇编》所收重复；《中国科举录汇编》收入宣德八年，成化十一年，正德三年，嘉靖四十一年、四十四年，万历二十九年、三十五年共 7 科《登科录》（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10 年影印本），其中，宣德八年，成化十一年，嘉靖四十一年共 3 科《登科录》与《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明代登科录汇编》所收重复，《嘉靖四十四年进士登科录》与《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所收重复；上海图书馆藏有永乐九年、正统元年、弘治十二年、万历二十六年、万历三十二年共 5 科《登科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有《万历三十八年进士登科录》。

存明代 58 科《登科录》为基础, 辅以《皇明进士登科考》《皇明贡举考》《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等科举文献, 对南直隶鼎甲进士姓名及其隶属州县逐一进行统计, 见表 1:

表 1 明代南直隶鼎甲进士统计表

科次	姓名	功名	隶属州县 ^①	科次	姓名	功名	隶属州县
洪武二十四年	许观	状元	贵池县	永乐九年	苗衷	榜眼	定远县
永乐十六年	刘江	榜眼	江宁县	永乐二十二年	邢宽	状元	无为州
正统四年	施槃	状元	吴县	正统四年	倪谦	探花	上元县
景泰二年	王偲	探花	武进县	景泰五年	徐溥	榜眼	宜兴县
景泰五年	徐鑑	探花	武进县	天顺八年	吴□	榜眼	昆山县
成化二年	陆简	探花	武进县	成化五年	丁溥	榜眼	华亭县
成化八年	吴宽	状元	长洲县	成化十一年	王鏊	探花	吴县
弘治三年	钱福	状元	华亭县	弘治三年	靳贵	探花	丹徒县
弘治六年	毛澄	状元	昆山县	弘治九年	朱希周	状元	昆山县
弘治十八年	顾鼎臣	状元	昆山县	正德三年	景昶	榜眼	上元县
正德九年	唐皋	状元	歙县	正德九年	蔡昂	探花	山阳县
正德十二年	崔桐	探花	海门县	嘉靖二年	徐阶	探花	华亭县
嘉靖二十年	沈坤	状元	山阳县	嘉靖二十年	林一凤	探花	江宁县
嘉靖二十三年	瞿景淳	榜眼	常熟县	嘉靖二十三年	吴情	探花	无锡县
嘉靖二十六年	李春芳	状元	兴化县	嘉靖三十二年	曹大章	榜眼	金坛县
嘉靖三十八年	丁士美	状元	清河县	嘉靖四十一年	徐时行	状元	吴县
嘉靖四十一年	王锡爵	榜眼	太仓州	隆庆五年	刘城	榜眼	吴县
万历二年	孙继皋	状元	无锡县	万历二年	余孟麟	榜眼	江宁县
万历五年	沈懋学	状元	宣城县	万历十四年	唐文献	状元	华亭县
万历十七年	焦竑	状元	江宁县	万历二十年	顾天竣	探花	昆山县
万历二十三年	朱之蕃	状元	江宁县	万历二十三年	汤宾尹	榜眼	宣城县
万历二十三年	孙慎行	探花	武进县	万历二十六年	顾起元	探花	江宁县
万历二十九年	张以诚	状元	青浦县	万历二十九年	王衡	榜眼	太仓州
万历三十二年	吴宗达	探花	武进县	万历三十八年	钱谦益	探花	常熟县
万历四十一年	周延儒	状元	宜兴县	万历四十七年	孔贞运	榜眼	句容县
天启二年	文震孟	状元	长洲县	天启二年	陈仁锡	探花	长洲县
天启五年	华琪芳	榜眼	无锡县	天启五年	吴孔嘉	探花	歙县
崇祯元年	刘若宰	状元	怀宁县	崇祯元年	管绍宁	探花	武进县
崇祯四年	陈于泰	状元	宜兴县	崇祯四年	吴伟业	榜眼	太仓州
崇祯四年	夏曰瑚	探花	山阳县	崇祯七年	吴国华	榜眼	宜兴县
崇祯七年	杨昌祚	探花	宣城县	崇祯十年	赵士春	探花	常熟县
崇祯十六年	杨廷鉴	状元	武进县	崇祯十六年	宋之绳	榜眼	溧阳县
崇祯十六年	陈名夏	探花	溧阳县				

① 本表鼎甲进士现籍地原属军卫者一般归入该卫所在州县。此类情况有 6 名, 分别是正德九年探花蔡昂, 淮安卫军籍, 归入山阳县; 嘉靖二十年状元沈坤, 大河卫军籍, 归入山阳县; 嘉靖二十年探花林一凤, 南京龙江右卫军籍, 归入江宁县; 隆庆五年榜眼刘城, 苏州卫军籍, 归入吴县; 万历十七年状元焦竑, 南京旗手卫官籍, 归入江宁县; 万历二十三年状元朱之蕃, 南京锦衣卫军籍, 归入江宁县。

由表 1 可知,明代南直隶鼎甲进士共有 65 人,占明代鼎甲进士总数的 24.34%,接近明代鼎甲进士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状元 24 名,榜眼 18 名,探花 23 名,分别占明代状元、榜眼、探花总数的 26.97%、20.22%、25.84%,南直隶鼎甲进士名列全国前茅。因其姓名和隶属州县皆可得到确认,故为准确统计其地域分布并揭示其分布特点提供了前提条件。

二 明代南直隶鼎甲进土地域分布特点及其成因

表 1 显示了明代南直隶鼎甲进士的姓名及其隶属州县,但不能直接反映其地域分布及其特点。兹以此表为基础,对鼎甲进士的隶属州县作进一步整理和统计,见表 2:

表 2 明代南直隶 65 名鼎甲进土地域分布统计表

府	县（州）	鼎甲进士数	总计	府	县（州）	鼎甲进士数	总计	府	县（州）	鼎甲进士数	总计
池州府	贵池县	1	1	凤阳府	定远县	1	1	应天府	江宁县	6	11
苏州府	吴县	4	18	庐州府	无为州	1	1		上元县	2	
	昆山县	5		常州府	武进县	7	14		溧阳县	2	
	长洲县	3			宜兴县	4			句容县	1	
	太仓州	3			无锡县	3	徽州府		歙县	2	2
	常熟县	3		镇江府	丹徒县	1	1	扬州府	海门县	1	2
松江府	华亭县	4	淮安府	金坛县	1	5	兴化县		1		
	青浦县	1		山阳县	3		安庆府	怀宁县	1	1	
宁国府	宣城县	3		3			清河县	1			

据表 2 分析,南直隶鼎甲进土地域分布呈现以下特点:

首先,鼎甲进土地域分布广泛。南直隶十四府、四直隶州中十三府皆有鼎甲进士分布,分布在东起海门、西至无为州,南起歙县、北至清河,东南起华亭、青浦,西北至定远,东北起山阳,西南至贵池、怀宁近乎全境的广大地区。

其次,鼎甲进土地域分布很不平衡。十三府以鼎甲进士多少排序,分别是苏州府 18 人,常州府 14 人,应天府 11 人,松江府和淮安府各 5 人,宁国府 3 人,徽州府和扬州府各 2 人,池州府、凤阳府、庐州府、镇江府、安庆府各 1 人,总体上东多西少。其中,地处东部的苏州、常州、应天、松江、扬州、镇江六府共有鼎甲进士 51 人,占南直隶鼎甲进士总数的 78.46%;而苏州、松江、应天三府共有鼎甲进士 43 人,占南直隶鼎甲进士总数的 66.15%。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地处西部的凤阳、庐州二府,共有 2 名鼎甲进士,仅占南直隶鼎甲进士总数的 3.08%。南直隶有 3 名以上鼎甲进士的州县共 12 个,虽分别仅占南直隶州县数和拥有鼎甲进士州县数的 10.53% 和 46.15%,但其鼎甲进士数却占南直隶鼎甲进士总数的 73.85%;吴县、昆山、华亭、武进、宜兴、江宁六县虽分别仅占南直隶州县数和拥有鼎甲进士州县数的 5.26% 和 23.08%,但其鼎甲进士数却占南直隶鼎甲进士总数的 46.15%;在鼎甲进士分布最为稀少的凤阳、庐州、安庆、池州四府,作为安庆、池州二府府治的怀宁县和贵池县却考出了 2 名鼎甲进士,占四府鼎甲进士总数的一半。

造成上述地域分布特点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就鼎甲进土地域分布的广泛性来说,明代在南直隶各地普遍设立的府、州、县儒学并持久提供种种优惠的官学教育^①,以及各地民众对科举考试普

^① 明代生员不仅享有免费固定的学习场所和“除本身外,户内优免二丁差役”的优待,廪生还可享受免费的伙食待遇,(万历)《明会典》卷 78《学校·儒学·风宪官提督》,第 454 页。

遍的热衷和追求，应是造成鼎甲进士分布广泛的最重要原因。就鼎甲进土地域分布的不平衡性来说，成因相对复杂，最直接的原因应是各府、州、县科举实力不均衡。据统计，明代南直隶拥有鼎甲进士最多的五个县——华亭、武进、昆山、吴县、江宁，同时也是拥有进士最多或较多的县^①。这说明各府、州、县的科举实力乃是其竞取鼎甲进士最为直接的支撑力，科举实力愈强，其鼎甲进士愈多；反之亦然。而各府、州、县科举实力的不均衡又是以下综合因素而造成。

首先是人口因素。科举考试是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以儒学素养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竞争，故而各府、州、县拥有一定的人口规模是其具有竞争优势的前提条件。兹据（万历）《明会典》统计南直隶十四府、四直隶州人口数及其排序：

表 3 明代南直隶十四府、四直隶州人口数及其排序表

府州名	苏州	凤阳	常州	淮安	扬州	应天	庐州	徽州	安庆
人口数（万人）	201.1	120.2	100.2	90.6	81.7	79	62.2	56.6	54.3
府州名	松江	宁国	徐州	广德州	太平	镇江	和州	池州	滁州
人口数（万人）	48.4	38.7	34.5	22.1	17.6	16.5	10.4	8.4	6.7

如表 3 所示，南直隶十四府、四直隶州中人口数最多的是苏州府，而从上文可知南直隶鼎甲进士最多的府也是苏州府；淮安府人口数名列第四，其鼎甲进士数也名列第四。这都说明不同地区的科举实力确与其人口规模存在一定联系。但除苏州、淮安二府之外的其他十一府的人口数排名与其拥有的鼎甲进士数排名又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错位：常州府人口数名列第三，但其鼎甲进士数却名列第二；应天府人口数名列第六，但其鼎甲进士数名列第三；松江府人口数名列第十，但其鼎甲进士数名列第四；宁国府人口数名列第十一，但其鼎甲进士数名列第五；扬州、徽州二府人口数分列第五、第八，但其鼎甲进士数却并列第六；凤阳、庐州、安庆、镇江、池州五府人口数分列第二、第七、第九、第十五、第十七，但其鼎甲进士数却并列第七。以上情况表明：人口规模只是获得科举竞争优势的必备条件，而非唯一条件；要把人口优势真正变成科举竞争优势，还需具备其他条件。

其次是经济和交通因素。明代南直隶的经济重心和交通发达之地是在东部，东部工商业发达，市镇经济繁荣，京杭运河通贯其中，使其成为全国的商品生产基地和商品流通中心。苏州、松江的棉布，苏州、南京的丝绸，衣被天下，海内依赖。苏州府市镇经济发展显著，至嘉靖二十九年（1550），市镇数量已增长了 102 个^②。其中，吴江县盛泽镇，“舟楫塞港，街道肩摩，丝绸之利日扩，南北商贾咸萃。蕃阜气象，诸镇中推为第一”^③。明末，松江府市镇已发展至 61 个。其中，青浦县朱家角镇，“商贾凑聚，贸易花布，京省标客，往来不绝，今为巨镇”^④。此外，因其地形以平原为主，雨量充沛，气候适宜，适合农业以及桑、棉、瓜果等多种经营，且农业精耕细作冠于全国。而西部凤阳府“土旷人稀，人不经商”^⑤；庐州府“民众不喜商旅，鲜事工商，专务稼穡”^⑥。东西部之间的上述差别显然成为其科举实力不均衡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地处东部的苏州、常州、应天

① 明代南直隶华亭、武进、昆山、吴县、江宁五县拥有进士数分别是 258 名、229 名、154 名、87 名、64 名，其中华亭、武进二县进士数分别名列第一、第二，昆山、吴县二县进士数分别名列第六、第七，江宁县进士数名列第十六。参见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56—259 页。

② 范毅军：《明中叶以来江南市镇的成长趋势与扩张性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2 年第 3 期。

③ （康熙）《吴江县志》卷 1《市镇》，康熙二十四年刻本。

④ （崇祯）《松江府志》卷 3《镇市》，《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 23 册，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5—66 页。

⑤ （康熙）《凤阳府志》卷 4《风俗》，康熙二十三年刻本。

⑥ （光绪）《庐州府志》卷 8《风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 86 号，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0 年影印版，第 128 页。

三府在交通和信息方面的优势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苏州、常州、应天北襟江，东傍海，京杭运河通贯其中，境内港湾星罗棋布，舟楫往来自如，文人雅士结社讲习，信息传递便捷；苏州、南京“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荟萃焉”^①。位于交通便捷区域的吴县、昆山、长洲、常熟、太仓州、华亭、武进、无锡、宜兴、江宁、山阳共十一州县，虽仅占南直隶州县数的9.73%，却考出了45名鼎甲进士，占南直隶鼎甲进士总数的69.23%。所有这些，无疑得益于交通便捷带来的物流、人流和信息流对于当地经济、文化发展和形成浓厚的科举氛围所起的促进作用。

第三是教育因素。教育是传承科举考生之间核心竞争力——儒学文化素养的主要手段，而宏伟壮观的官办学校与辈出的人才有机联系的。吴人王铤言：“吾苏学宫，制度宏观，为天下第一。人才辈出，岁夺魁首。”^②徐有贞则说：“苏为郡甲天下，而其儒学之规制亦甲乎天下……吾苏也，郡甲天下之郡，学甲天下之学，人才甲天下之人才，伟哉！”^③王鏊也说：“苏学独名天下……自宋以来科第往往取先天下，名臣硕辅亦多发迹于斯。”^④苏州府拥有鼎甲进士数排序在南直隶名列第一，显然得益于宏伟壮观的官办儒学规制带来的物流、信息流等各种科举应试的便利条件。

第四是政治因素。在官本位社会，区域政治优势及其带来的官方教育和文化资源无疑会对各府、州、县的科举竞争力强弱产生重要影响。如南直隶考出鼎甲进士的十三个府，除凤阳、庐州、扬州三府治外，其余十府治都考出了鼎甲进士，且武进、江宁、吴县、华亭四县分别考出鼎甲进士7、6、4、4名，武进、江宁分别居南直隶各州县拥有鼎甲进士数的第一、二名，吴县和华亭并列第四名。此应与各府治作为一府政治中心，其聚集的官方教育和文化资源最为集中直接相关。

最后是科举氛围因素。科举氛围的差异是影响各府、州、县科举竞争力的重要原因。应天、苏州、常州、松江四府民众好读诗书，“历代师儒之传述，家弦户诵，风气开先，拔帜匪难，夺标自易”^⑤。这种“家弦户诵”的习俗由来已久，蔚然成风，昆山、常熟、武进三县民众尤其热衷科举，皆以科举为首业。如昆山县“人好学而知礼，家知读书”^⑥。常熟县“士之习诗书者，诵读声比屋相闻”^⑦。武进县“人崇诗书，敦礼让，弦诵声比屋而是，故科第蝉联，人文甲天下”^⑧。浓厚的科举氛围激励士子们不断投身科举，才创造了苏州、常州、应天、松江四府分别居南直隶各府拥有鼎甲进士数第一、二、三、四名的辉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凤阳、庐州二府民众“皆皆窳轻，多游手游食”^⑨。可见，不同地区的科举氛围差异会对其鼎甲进士数的多寡产生重要影响。

三 明代南直隶鼎甲进士家庭出身与社会流动

明代南直隶鼎甲进士上三代直系亲属出身构成状况，可以通过现存明代58科《登科录》解读，《登科录》对每位进士上三代直系亲属出身构成状况都有详细记载。南直隶共有65名鼎甲进士，通过逐名比对，在现存《登科录》中可查到37名鼎甲进士上三代直系亲属出身构成状况。此外，现

①（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4《经籍会通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8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08页。

②（明）王铤：《寓圃杂记》卷5《苏学之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2页。

③（明）钱穀：《吴郡文粹续集》卷3《学校·苏郡儒学兴修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85册，第71—72页。

④（明）王鏊：《震泽集》卷13《苏郡学志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6册，第273页。

⑤（清）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2，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2页。

⑥（万历）《重修昆山县志》卷1《风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433号，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影印版，第43页。

⑦（康熙）《常熟县志》卷9《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2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65页。

⑧（道光）《武进阳湖县合志》卷2《舆地志二·风俗》，光绪十二年刻本。

⑨（明）张瀚：《松窗梦语》卷4《商贾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4页。

存明代《履历便览》《同年录》对每位进士上三代直系亲属出身构成状况也有详细记载，通过逐名比对，可查到 14 名南直隶鼎甲进士上三代直系亲属出身构成状况。以上共计 51 名鼎甲进士，占南直隶鼎甲进士总数的 78.46%，以此为考察对象，可反映南直隶鼎甲进士家庭出身的大致情况。表 4 即是对 51 名南直隶鼎甲进士上三代直系亲属出身构成状况进行考证确认和分类统计的结果：

表 4 明代南直隶鼎甲进士家庭出身统计表

上三代直系亲属出身类别	无任何功名、官号和虚衔	仅有学校功名	仅有虚衔	有任实职官者	有任从七品以上实职官者	有两代以上任从七品以上实职官者	有任从五品以上实职官者	有任从三品以上实职官者
人数	13	7	2	29	23	4	13	5

在 51 名鼎甲进士中，上三代直系亲属中无任何功名、官号和虚衔者共 13 人，占 25.49%，低于全国进士出自上三代直系亲属皆为平民家庭者 17.85 个百分点^①；仅有学校功名（庠生、监生）者 7 人，占 13.73%；仅有虚衔（遇例冠带、寿官）者 2 人，占 3.92%；真正有任实职官者 29 人，占 56.86%；43.14% 的南直隶鼎甲进士出身于上三代直系亲属无任实职官的家庭。从纵向考察而论，在永乐九年（1411）至弘治九年（1496）间的 15 个南直隶鼎甲进士中，上三代直系亲属无任何功名、官号和虚衔者共 5 人，也就是说该期出自平民家庭的鼎甲进士占同期统计南直隶鼎甲进士总数的 33.33%^②；在弘治十八年至隆庆五年（1571）间的 14 个鼎甲进士中，此类情况者共 6 人，占同期统计南直隶鼎甲进士总数的 42.86%^③；在万历二年至崇祯十年间的 22 个鼎甲进士中，此类情况者仅 2 人，只占同期统计南直隶鼎甲进士总数的 9.09%^④，比上期大幅度降低了 33.77 个百分点。据统计，嘉靖二十六年至隆庆五年间 9 科 3114 名进士中出身于上三代直系亲属无任何功名、官号和虚衔者共 1282 名，占同期进士总数的 41.17%^⑤；万历二年至崇祯十年间 9 科 2788 名进士中此类情况者共 897 名，占同期统计进士总数的 32.17%^⑥，比上期降低了 9 个百分点。这说明隆庆以后南直隶鼎甲进士的社会流动速度不仅与全国进士一样明显放缓，而且出自上三代直系亲属俱为平民家庭者的比例低于全国同期进士 23.08 个百分点。

出现如此明显的变化，应是由以下两个原因而造成：一是官宦家庭对其子弟科举中式的影响在隆庆以后明显加强。如本文统计的上三代直系亲属有任实职官的 29 名鼎甲进士，属于永乐九年至弘治六年 11 者 8 人；属于弘治九年至隆庆五年 12 科者 6 人；属于万历二年至崇祯十年 15 科者 15 人，是第一阶段的 1.88 倍，是第二阶段的 2.5 倍，自然大大降低了隆庆以后出身于上三代直系亲属俱为平民家庭的鼎甲进士的比例。二是由于官办学校教育的发展，明中后期进士上三代直系亲属

① 明代出身于上三代平民家庭的进士，占统计进士总数的 43.14%，详见郭培贵：《明代进士群体社会流动的再探讨》，《明朝及其所处历史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廊坊师范学院 2017 年，第 56—60 页。

② 该数系据永乐九年，正统四年，景泰二年、五年，天顺八年，成化二年、五年、八年、十一年，弘治三年、六年、九年《进士登科录》考证确认统计而得。

③ 该数系据弘治十八年，正德三年、十二年，嘉靖二年、二十年、二十三年、二十六年、三十二年、三十八年、四十一年，隆庆五年《进士登科录》考证统计确认而得。

④ 该数系据万历二年、五年、十一年、二十九年、三十二年、三十八年《进士登科录》和《万历十四年进士同年总录》（台北学生书局 1969 年影印本）以及万历二十年、二十三年、二十六年，崇祯元年、四年、七年、十年《进士履历便览》（宁波出版社 2006 年影印本）考证确认统计而得。

⑤ 该数系据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九年、三十二年、三十五年、三十八年、四十一年、四十四年，隆庆二年、五年《进士登科录》考证确认统计而得。

⑥ 该数系据万历二年、五年、八年、十一年、二十九年、三十五年《进士登科录》及崇祯四年、十年《进士履历便览》考证确认统计而得。

中仅有学校功名而无任实职官者不断增多。据统计,“明代出身于‘上三代直系亲属仅有功名而无实职官’家庭的进士所占比例,正统十年为 0,成化八年为 2.4%,嘉靖二十三年为 8.33%,万历三十二年为 15.91%,崇祯十年为 54.49%”^①,呈直线上升趋势。至明末,此类家庭出身的进士居然超过了统计进士总数的一半。而本文统计的 7 名上三代直系亲属仅有学校功名的南直隶鼎甲进士有 5 名出自万历年间,同样降低了出身于上三代直系亲属俱为平民家庭的鼎甲进士的比例。

由上可知,隆庆以后南直隶出身于平民家庭的鼎甲进士所占比例显著下降,除主要由于官宦家庭对其子弟科举中式影响显著加强外,还由于出身于上三代直系亲属仅有学校功名家庭的鼎甲进士不断增多。严格来说,尽管“仅有学校功名”和“平民”有区别,但还不能算作官宦之家,而是处于二者之间的过渡地带。况且,在 29 名上三代直系亲属有任实职官的鼎甲进士中,上三代直系亲属担任过从七品以上实职官者有 23 人,担任过从五品以上实职官者有 13 人,担任过从三品以上实职官者仅有 5 人,说明这 29 名鼎甲进士绝大部分都出自中下级官员家庭;若以代数而论,在 23 名出自上三代直系亲属有任从七品以上实职官家庭的鼎甲进士中,仅有 4 名有两代以上担任过从七品以上实职官,也就是说 19 名鼎甲进士上三代直系亲属中只有一代担任过从七品以上实职官;且有 20 名上三代直系亲属有任实职官的鼎甲进士在其中进士时,其曾任官的曾祖、祖父、父亲已经致仕或亡故。以上皆说明官宦家庭对其子弟科举中式的影响并非主要凭借政治特权,而主要是依其家庭有利的经济、教育文化条件和科举氛围。在 29 名出自上三代直系亲属有任实职官家庭的南直隶鼎甲进士中,有 4 名出自上三代直系亲属有举人功名的家庭,有 12 名出自上三代直系亲属有进士功名的家庭,即 55% 的出身于实职官家庭的南直隶鼎甲进士出自科举之家,其中顾天竣、赵士春还出自两代科举之家,皆说明科举功名对子孙科举中式所起的积极影响。因此,出自官宦之家的鼎甲进士仍主要是靠科举保持家庭声望和社会地位,即主要依靠自身综合实力在激烈的科举竞争考试中脱颖而出,故而科举制度仍被时人认为“二百年来,法度之至公至慎者,独此一途耳”^②!

综上,不同区域的科举竞争归根结底是综合实力的竞争。一个地区科举实力的强弱,首先取决于该地人才儒学文化素养的高低,而这又是由人口规模,经济发达程度,政治和教育资源,科举氛围等诸多因素共同决定的。唯有形成和保持各方面优势,才能在科举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在明代,科举考试成为平民进入官绅阶层的唯一途径,成为社会流动的主要方式。科举考试更是一场持久性竞争,“缙绅家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守”^③,官宦家庭在其固有的应试科举优势外,需几代人付出持久而不懈努力,始终秉承积极进取精神,才能保持社会地位而不被时代淘汰,这本身又进一步推动时人对科举制度的认可。

【项目说明】本文系 2017 年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明代福建进士群体研究”阶段成果,项目编号:FJ2017Z009。

(作者管宏杰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郭培贵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 邮编 350117)

(责任编辑 哈恩忠)

① 郭培贵:《明代山东解元的空间分布与社会流动》,《东岳论丛》2015 年第 3 期。

②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 14《事部二》,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87 页。

③ (明)王士性:《广志绎》卷 4《江南诸省》,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70 页。